

从“Avant Garde”到“逆经典化” ——关于《湍流》诗群思想之隅见

高若栋¹

(1.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香港 999077)

摘要: 作为兼具地方文化属性、整体时代意识的诗人集群, 关于《湍流》的发展, 已事实上形成了一部近十余年中国诗坛罕有的流派艺术史。本世纪以来, 面临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代表的文人进入所谓“中年”阶段, 且若干“民间诗坛”人物或被外物所收编, 或在商业秩序内逐步丧失探索意识, “湍流诗群”成为近乎孤独的高度独立的文学力量。细窥其创建及演进的更迭脉络、理论及精神的价值建构, 本质正是对“先锋”概念的继承和扩变、面朝“经典化”浪潮的抵御和重塑。诗群思想所展露的对历史、命运的凝视与转译, 对诗歌价值的呼唤与拱卫的姿态, 正逐步或必然引发当代诗史的颤动。

关键词: 当代诗学; 《湍流》诗刊; 先锋思潮; 跨越性

DOI: doi.org/10.70693/202607317142

关于“先锋”的诠释、争辩、沉寂和重振, 是百年新诗史上反复出现的重要问题, 尤其是20世纪晚期“新诗潮”及“第三代”诗歌运动阶段, 无论“今天派”诸君, 或更晚发轫的“非非主义”等百家争鸣的民间流派, 都以各自的理解和主张镌刻着各异的意涵。而《湍流》创刊及诗群的建设, 则是发生在其数十年之后, 毫无疑问对前人存在大量的经验继承与汲取、价值反思和追索, 在盛宴旧址或废墟上加固独立和探索的精神。进入2010年后, 诗坛呈现出上层口径中的繁荣局面, 在大量精英文人进入所谓收获时节, 安坐于“中年写作”的方寸时, 曾经激昂挥斥的“民间写作”若干代表也逐步在商业游戏中失去“前沿”的胆略与视野, 开始默许甚至享受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湍流》诗群的诞生发展, 正是对“先锋”意识和“诗歌”尊严的唤醒或延续。在路径上, 再次复现从地区到全国的交互轨迹, 从思想上, 不断强调独立和深掘的前进精神。这既是继承业已萧条的“旧先锋”的某种衣钵, 也是对文学新问题及时代新生态的阐释或批评的开拓, 为历史的深渊划出一道今日的鳞波。

一: 荆湖与中国: 地方诗群的嬗代史

具备浓郁现代性意识的诗群, 实则拥有着深刻的古典化背景, 湍流激起的第一捧浪花, 携带着某种隔代的温情。追溯“湍流诗群”的诞生, 首先维系于其核心刊物《湍流》的发展之上, 而此刊之精神及初创团队的雏形, 则应当锚定在“后语言主义”的萌芽史之中, 在2010年秋, 野梵为代表的几位湖北公安籍诗人在历经酝酿后, 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因此诗群的身世族谱中, 存在着两项重要的价值烙印, 即围绕公安地区的地缘属性, 以及“后语言主义”思想的核心驱动力。在当代新诗史上并未存有太多镜头的公安地区, 在更为宏阔的纵深历史维度上, 却拥有一条甚为悠久和多元化的诗学根脉, 其与荆湖地区的楚文化、秦汉时期的诗赋艺术, 乃至整个南中国的文事传统, 都存在着亲密复杂的关联。在屈、宋掀起骚体艺术的时代, 孱陵县还尚不具备独立的文艺属性或政治光谱, 在汉江腹地与长江中游的楚国核心区域内, 长期作为郢、鄢、都三座都城的附属概念存在, 在顷襄王迁都于陈郢、寿春之前的多数时间内, 孱陵县因紧邻王都的地理优势得以沐浴到楚文化的大量光辉。进入汉末, 曹军南下、赤壁鏖兵, 刘备集团在经略荆襄地区时将治所选在了孱陵县, 自此地名变换, 公安之称得以出现。其后岁月中政权变更、区划调整虽时有调整, 但“公安”之名被多次采纳, 继而沿用至今。

正如《湍流诗丛》总序中所指出“朝向多种可能性的诗学创艺建构和愈益个人化的书写生态”[1]的追求一般,

作者简介: 高若栋(2003—), 男,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兼任《社科前沿》《大湾区发展研究》及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 Arts 编委, 主要从事当代诗学批评、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

在五百余年前的同一片土地上,袁宏道通过《与江进之》指出了“世道既变,文亦因之”[2]的行文著诗之理念,在这份对社会变迁、时代变革等综合因素的更迭环境下开展对文学创作的调整和拓展的思想脉络之上,湍流众人与前贤展现出惊人的相似。而《叙小修诗》中记载的另一条源自万历时期箴言,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3],同样直指向对“个人化书写生态”的推崇,在公安的城垣边,当代诗人与故去前辈之间,达成一条隐秘而不可割裂的继承链条,这既是明中晚期“公安派”留给诗坛的遗泽,也是当今“湍流诗群”对历史的回应与肩负。事实上,两者在诗学上的关联远不止于此,细窥诗册,一种古老的“先锋”精神和对“语言价值”变构的逻辑能够被析出。曾几何时,面临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王九思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所罗织的价值迷雾,文坛的整体气象与发展追求,在此辈权威文人与官僚士林的倡议中走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及“大历以后书勿读”[4]的偏颇境地,诗歌的发展跌入复古的单调路线,意象与语言必生于秦砖汉瓦、前唐阙顶,而对其后的文脉发展之结晶、历史变更之经验,乃至置于当下的最真实也是最为迫切的时代意识不加重视。海内鲜少有能挥袖而反抗者,直到“公安派”的崛起彻底形成对此潮流的逆向一击,立足公安的“三袁”及江盈科、陶望龄等诗人在16世纪明帝国文坛的一派作为,本质上已经高度契合后世所谓“先锋”的艺术精神。

作为20世纪后期中国诗坛极负盛名的理论家,同时也是“湍流诗群”所谓“诗友圈”或“顾问团”的重要成员,周伦佑曾指出“领先于时代的审美观念”[5]是“先锋”的重要特质。诚如是,在此概念之中去反溯“公安派”的若干主张,似乎能够看到其对“理”的解构,和关乎“民间”的重视,正是超出同期的审美追求。在诗人的笔端,从一元走向多元、由“个我”走向“他我”的标志清晰可见,这种近乎于自觉的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反思、对当下时代问题(或称之为“在场性”)的注重,与“湍流诗群”在21世纪曝露的部分内核,能够产生深刻的映射与共鸣。在晚明时代,“公安派”的影响逐步从地方走向全国。一代本土文人的故去,并未代表文学精神上休止符,其后同属荆湖地区的“竟陵派”对其由些许继承,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安文人的文思早已不受地域出身、乡梓关联所束缚,已然成为凭借价值感染力,散射更宽阔境地甚至是融入历史经验的力量。而“湍流诗群”从公安一城走向中国诗坛的发展印记也几近于此。

大概以2014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诗群,作为本土班底所建设的文学组织,其发展与波折主要聚集于公安地区之内,因其地缘属性,与“公安派”为代表的古典文论土壤之间存在着深厚联系,此阶段的诗群几乎可以视作“新公安派”的旗帜。作为荆州籍(包含公安县)出身的诗人野梵、黑丰、蓝冰及许晓青组成了诗群最核心的创始团队,对其整体理论构筑和刊物、书系等项目及衍生品的策划具备决定性影响。其中蓝冰拥有偏向于乡土色彩和民间写作的底色,虽在诗群发展过程中不断完成语言向内探索的迭变,但基础质地仍在潜意识中留存,这一点与更早期的公安地区诗人,如陈应松、邹平、魏宁等人存在共性。许晓青则是荆州作家协会体系出身的诗人,具备体制文人所一贯的持重稳定风格,因而在对现代性与历史信息的接续研究中,为诗群的理论版图丰盈化,做出了较为关键的贡献。野梵和黑丰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诗学出身,以及二者之间所发生的创作与理论意识上的龃龉或矛盾,则堪称诗群中前期最大的分水岭。前者深受“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以“非非主义”“整体主义”为代表的对语言解构或重释路径的影响,对1985年后的若干批评家关于诗学语言的判断或实验深有掌握。后者则有相对明显的学院气质,具有跨学科或整体联动性质的综合视阈,对以左翼倾向为代表的文化理论批评、社会乃至政治凝视存在兴趣,同时逐步走向德勒兹(gilles deleuze)式的“持续向内”的书写状态。因此,若扁平化看待,野梵与黑丰之路径矛盾,似乎也能概括为对诗歌文本探究的执着,和对整体文化层面的批评欲望之间的分歧。在《湍流》诗刊的第三期黑丰卸任联合主编职务并宣布脱离流派之前,几乎维持了三年的两人共掌枢机的阶段,在此期间,包括袁小平、仪桐、冬羽、龚道军等诗人相继加入。他们普遍具备两个特点,首先是公安或泛荆州籍贯出身,笔端近乎天然携带地理单元的烙印;其二,则是多数无前置的流派意识或参与经历,长期在地方刊物及圈层活动发表,并未深度参与任何一全国性的诗歌集群,也因此加入“湍流”之后,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即接受了“后语言主义”的改造,成为诗群中前期形态下的中坚力量。

处于“地方阶段”的诗群,将两个主要特点不断洗刷、延续了下去,在其后长期的扩张、变革发展中成为难以撼动的基因。其一,是对地缘及历史身份的重视,这种深刻的所谓“姿态(Cesture)”或“语境(Context)”的概念或可阐释为“有意味的形式,或形式化的内容”[6],处于江汉平原南端,抵近或交汇于洞庭湖平原的公安地区,河泽密布、大江穿流,其土地之肥沃和物产之稳定,在多数历史时期远胜于北方多地区,对比更西端的巴蜀腹地也不遑多让,如此环境所孕育的楚人介乎于神祇和知命、现实与虚妄之间的美学意识,以及流动于豁达和慎思、清孤及入世的思想传统,深刻浸染着每一代文林,而“湍流诗群”的成员也并不例外地有所承袭。如此的对历史信息和古典价值的注重,让野梵创造诸如“借重冒领的月光/我几乎摸到一丝嵇康的旧梦”[7]的诗句,成为

相当自然的事情。其二，是以野、黑、蓝、许为主的核心班底所展现的对世纪末诗歌浪潮的关注、流派意识的检索、语言价值的汲取，诗群彼时的众多“价值观”或“纲领”字缝之间似乎都能看到发祥于多处的“先锋”印记，譬如许晓青曾在论章中，将生命体验的追求描述为“刀锋上完成句法转换”[8]的境界，而这一“刀锋概念”与“非非主义”创始人周伦佑的代表作高度吻合，而其所提倡的“体制外写作”姿态及“反暴力修辞”[9]的创作路径，对湍流众人同样产生着影响。甚至时至今日，诗群理论架构中，仍然能够清晰看到对“非非化”语言意识的继承。

在2014年之后，诗群陆续开始吸纳来自全国的加盟成员，那些拥有着学院背景、精英底色、文化领域职业身份的诗人逐步成为蓬勃的力量，他们中的部分人携带着浓烈的后现代主义或各种先锋思想，助推着诗群从始于公安一隅、活跃于荆湖一地的文学沙龙，扩变为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拥有影响力和关联性的诗歌流派，为其后的诗坛交际、诗学活动铺垫了强力基础。来自上海、深圳、聊城、南京等多地的诗人，有着不同的地域出身、文化背景，共同相聚，充分印证了尤涅斯库(Eugene Ionesco)所说的“就是自由”[10]的“先锋派”的定义。诸如吴长青为代表的具备文艺研究功底的人员，由于熟稔1980年代以来中国诗坛(主要是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路径与文本剖析，得以对诗群的理论版图进一步丰盈和修正提供助力。冰马为代表的诗人，具备1990年代“地下写作”的重要经历，属于活动于江苏等地民间诗坛的先锋代表。而与此同时，默雷、老非等诗人，则是较为典型的北方民间先锋诗歌的创作者。另有微紫、陈晓岚等，为诗群提供了较为都市化的创作经验，及女性视角的先锋意识、精神异化的价值视阈。在不断凝合、汲取成员的过程中，具备编辑、批评家、诗人三重角色的梁雪波的加入，或可视之为一个关键点。

二：舶来或跨越：先锋文化的氏族志

关于“先锋”概念，毫无疑问“湍流诗群”是伫立于前人肩头观望并试图改变世界的后继者，而至于彻底揭开“前人”的身世，则需要层层追溯，甚至跨越语种、国境、学科才能抵达最深邃的本源。这一概念在中国漫长的发展过程内并未产生意涵上的新突破，尤其是对文化与文学层面的介入几乎不见踪影，中国的诗家与批评学者似乎如司空图一般更偏爱将诗歌领域所谓的对现世环境的突破、语言或意识的超出、理论界限的探索或文本深层的追逐，用更抽象化或本属于文化词汇内的语言概括，譬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14]的作品风格往往被视之为“雄浑”气质内的一种体现。东方语境下的“先锋”完整或以超越性的姿态进入文化及文学场域的时间应该锚定在20世纪上半叶，彼时西方在19世纪后率先完成了对这一词意的突破与扩变，继而伴随知识及战争的多向“全球化”浪潮，与中土的古老词语完成赋能、合流或新生。

当下英文场域内惯用的“Avant Garde”一词，其本身出自法语，属于经典的融创词汇，由象征“前方”或“前”的“Avant”一词，与代表“守卫”或“卫”的“Garde”一词拼凑而成，因此在其后漫长的传播岁月中，“先锋”的概念似乎也可以称之为“前卫”。这一代称译入汉语后，曾在中国社会一时风靡。追溯欧陆的“先锋”概念，其在18世纪及之前多数情况下，也与东方类似，属于较为普遍的军事术语，其代表的“先头部队”的原意，直到1852年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在《关于文艺的意见》中首次将其挪用，提出“以先锋的姿态”[15]形容艺术家之时，这个古老的法语词汇，才开始对文化领域产生介入，其意涵也随之扩充。近乎于同期，在社会哲学领域，傅立叶(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及蕾德汶(Robert Owen)等人在阐释“超前性社会制度”的过程中，亦将“先锋”的概念引入其中，用以暗指对传统或现状的叛逆性特质，这份包含政治色彩的“先锋”意蕴，后来被不断延续和扩张，最终成为在文学艺术界众口纷纭、热衷讨论的特质，活跃于当代的“湍流诗群”的理论体系中，便能够充分体现此类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先锋”元素。库贝尔(Gustave Courbet)是首个将“先锋”意识付诸实践的艺术创作者，在其“与主流文化对抗的创作倾向”[16]的精神之中，基本奠定了绘画等领域的一条不断衍生的流派路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运动”的性质与“先锋”的概念得到深度捆绑，自此所谓“先锋”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似乎都拥有着另一层形影不离的特征，即是热衷于号召、结社、宣言、集体亮相的活动模式。

正如洪治纲“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17]的论断，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几乎无处不在应验着这一点。以今视昔，或可将中国近现代的“先锋诗歌”进程划分为粗略的三个阶段，以1900年代至1930年代之间视之为第一部分，主要以晚清文学的潜在思想、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意识、新诗肇始后的诸流派探索争鸣为主要内容。以1978年至1980年代末视之为第二阶段，其中包含在思想、经济、社会形态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开放环境下，中国诗学与国际生态、域外价值的重新接轨和交流，大量吸纳甚至效仿其“先锋”姿态。以1990年代及其之后视之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中年写作”逐步涌现，大量具备代表性的

地下写作开始消散,有影响力的民间诗人或失去才华和意识,或在资本生活中被收编,而“湍流诗群”的生命自此刻开启。解读三个阶段,其本质正是对中国从“先锋文化”到“先锋文学”及“先锋诗歌”的递进式研究,也是对“先锋诗歌”这一概念的溯源,而最为重要则是,对“先锋文人”的姿态和价值观,做出尽量精确的判定。

事实上,在文化与文学领域,中国的“先锋”概念从发轫时期开始,即具备强大的破坏或激烈的价值,封建末期那种“被压抑的现代性(repressed modernities)”[18]在进入民国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文化环境之后,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被转换为爆炸式的、大变革式的思想风潮,在五四一代新诗的理论中,能够窥见对语言变革、形式颠覆的深刻倾向,而抬升到五四岁月的文化立场时,更为扩大化的、夸张的对整体文化价值、政治理念甚至是体制的冲击,成为近乎于家常便饭的事情。这似乎也奠定了百年来中国的“先锋诗人”所不断传递或暗自流淌的锋利的文化基因,陈思和将其概括为“一种以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裂变、发生解构的撞击”[19]的逻辑。直到1930年代之前,中国诗坛的整体环境都处于各向探索和互相搀扶、质疑、攻讦及合作的复杂状态,或有朝向白话化一路狂飙的诗人,力主持续解构汉语的严肃性和经典价值,或有如“学衡”诸君开展对古典根脉的复苏与遴选,另有“新格律”及“象征”等主张的诗人集群若干,这一切延续到抗战时期方才陆续偃旗。在20世纪上半叶的最后20年间,中国诗坛多元的“先锋”姿态不断遭受事实上的降调或瓦解,待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方才在上述所言的“第二阶段”内复苏,甚至汹涌生长。

对“湍流诗群”而言,那批20世末的文学发展、文化转迭的时代经验,是几乎奠定当代中国“先锋”流派理论体系的重要养分。时隔近数十年,在诗群众人的诗歌文本或批判观念中,似乎仍然能参透曾经思想界所热衷探讨或屏息的特殊话题,能窥见“今天派”时期的若干元素,能抉发出诸多“第三代”时期喧嚣一时或落寞沉寂的特质,能清晰看到对“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的论战遗骸中所收殓的精神遗骸。诗群的“先锋”意识,非止于对现状的审视和深思,另有前置的,对于文坛前人“生存”选择、姿态、去向和代价的思考。正如李泽厚在1986所提出的“启蒙”与“救亡”这两项“相互纠缠、相互形成辩证关系的重要命题”[20],直到今日依然可以用来刺破“湍流诗群”的一项底层逻辑,即穿透诗群所呈现的神秘的“应和”或“漩涡”状的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观点密集阵,能够看见一种始终周旋或挣扎的矛盾,作为理论体系所不断阐释的难以消弭的问题。诗群力求独立精神,保持对权力的警惕、资本的防范、尊严的拱卫和价值的探索,但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权力的来源和价值的走向、汉语生长或畸变所依赖的客观时代背景,以及几乎所有中国文人都不可逃避的受到“匹夫有责”的笼罩。诗群在事实上受制于诸多因素,也难以摆脱对其的注意乃至主动介入,诚如李泽厚所言,那份“启蒙”概念内包裹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开启民智、调和分歧、有序发展的一面主张,而“救亡”则意味着“革命”的路径,往往走向相对激烈、暴力的运动方式。而诗群的“先锋”意识正是介乎于对秩序的调和、沉着的处理,与激烈的博弈和运动之中的状态,诗群高举的反对“语言污染”“犬儒”等旗帜之下,是一颗对时代、政治、热点关注的内心,看似在诗坛的边缘地带自居一室,实则难以抑制对“中心”的瞻望或凝视。

不在少数的“第三代”诗人不断尝试解构权威、消弭不可言说之物事,开展对社会庸常关系、日常生活情状的书写的初衷,在世纪之交逐步开始发生偏移,不断拔升对口语的尊崇,以至于修辞的出现如同一种恶疾,中国传统诗学所讲究的雕琢之美,也被一概而论地批作无足轻重甚至具备反噬效果的不必要之物。在“湍流诗群”的文本思想中,即能够看到对这一问题近乎彻底的不认同,正如袁小平的长诗《词与命的个人行走》一般,通过对《诗经》等古典文化及历史信息的追索和化用,不断往返于古今诗境之间,直到打通为一体,而这样的对古典诗歌美学的处置,恰是海量的口语诗人所主观上摒弃、客观丧不可想象也无力做到的。在语言技法上,一种“壮夫不弃雕虫之功”[21]的特质,也超越了粗糙、泛化的庸碌口占。在1990年代后,其中一部所谓的“先锋诗人”陆续走上彻底的庸俗化泛滥的境地,开始将“非诗”的概念模糊化,对诗歌的理论进行破坏性批判,其为本世纪以来结合互联网诗坛而产生的诸种文字乱象展开媾和。所谓“以语言和观念为导向的跨平面设计的文本实验”[22]被畸变为对文学严肃性的瓦解、对汉诗道统的质疑。因此“湍流诗群”的发展,非止是对“第三代”诸多优秀贡献的继承和延伸,更为重要的是重新洗净、翻新“先锋”的徽标,使其重回具备壮肃意义、历史价值和哲学内涵的状态。重拾并拱卫汉语的尊严和价值,维持屹立的姿态。

参考文献:

- [1] 野梵. 僭越的语言在汉诗多变的远景中出场[J]. 湍流, 2024(9): 417-417.
- [2] 袁宏道, 著. 钱伯城, 笺校. 袁宏道集笺校: 卷十一《解脱集之四·江进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515-515.
- [3] 王小梅. 王学左派对袁宏道散文创作的影响[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58-58.

- [4] 薛泉. 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56 – 56.
- [5] 周伦佑. 当代先锋诗歌流派谱系考察——兼论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运动的流派学意义[J]. 文艺争鸣, 2018(3): 122 – 122.
- [6] 吴晓东. 临水的纳蕤思: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37 – 137.
- [7] 野梵. 野梵的诗 (六首) [J]. 长江丛刊, 2018(12): 120 – 120.
- [8] 许晓青. 独立苍茫自吟诗——从公安派到新公安派, 从灵性说到后语言主义[J]. 湍流, 2024(9): 337 – 337.
- [9] 林贤治. 论周伦佑[J]. 当代作家评论, 2010(2): 162 – 162.
- [10] 陈吉德. 新世纪中国先锋戏剧的民间精神[J]. 戏剧艺术, 2011(1): 56 – 56.
- [11] 杨四平. 元诗观念影响下中国当代先锋诗写作理论之省思[J]. 中国比较文学, 2025(3): 92 – 92.
- [12] 梁雪波. 修灯的人[M]. 后语言主义诗学基地, 2023: 111 – 111.
- [13] 高若栋, 尚仲敏. 先锋写作中古典意识的杂糅或复归——关于梁雪波诗歌思想的研究[J]. 燕赵中文学刊, 2026(1): 124 – 124.
- [14] 陈友康. 司空图著作权被质疑后《诗品》的价值和地位问题——以《“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为中心进行讨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 146 – 146.
- [15] 乔国强. 论波焦利的先锋理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156 – 156.
- [16] 王蕾, 段运冬. 认知转向与话语创新——“十月主义”的先锋影像观及其影响[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2(10): 35 – 35.
- [17] 洪治纲. 先锋文学聚焦之十八——永远的先锋[J]. 小说评论, 2022(6): 16 – 16.
- [18] 王德威. 晚清小说新论: 被压抑的现代性[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3: 15 – 15.
- [19] 陈思和.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2 – 2.
- [20] 刘悦笛. “启蒙与救亡”的变奏: 孰是孰非[J]. 探索与争鸣, 2009(10): 36 – 36.
- [21] 胡亮. 诗珠[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6: 45 – 45.
- [22] 朱其. 20 世纪先锋艺术和诗歌中文字主义的视觉实验[J]. 装饰, 2025(7): 106 – 106.

From "avant garde" to "anti classicalization"

——on the thoughts of poetry group in turbulence

Gao Ruodong¹

1.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s a group of poets with both local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turbulence has in fact formed a rare genre art history in Chinese poetry in the past decad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literati represented by "intellectual writing" have entered the so-called "middle-aged" stage, and a number of "folk poetry" figure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by the system and colleges, or have gradually lost the sense of exploration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turbulent poetry group" has become a highly independent literary force close to loneliness. A close look at the context of its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value construction of its theory and spirit, is essentially the inheritance and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pioneer", and the 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 wave. The poetry group thought reveals the gaze and translation of history and destiny, the calling and defending posture of poetry value. It is gradually or inevitably causing the vib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poetry.

Keywords: Contemporary poetics; Turbulence poetry journal; Avant garde thoughts; Leapfrogging